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高丙中 主编

WRITING CULTURE

写 文 化

—— 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 编
乔治·E·马库斯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写 文 化

——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 乔治·E. 马库斯 编
高丙中 吴晓黎 李 霞 等 译

商 務 印 書 館

2006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美)克利福德,
(美)马库斯编;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ISBN 7-100-04922-9

I. 写… II. ①克…②马…③高…④吴…⑤李…
III. 民族志—写作—研究 IV. 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 第 01481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写 文 化

——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 乔治·E. 马库斯 编
高丙中 吴晓黎 李 霞 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922-9/C·142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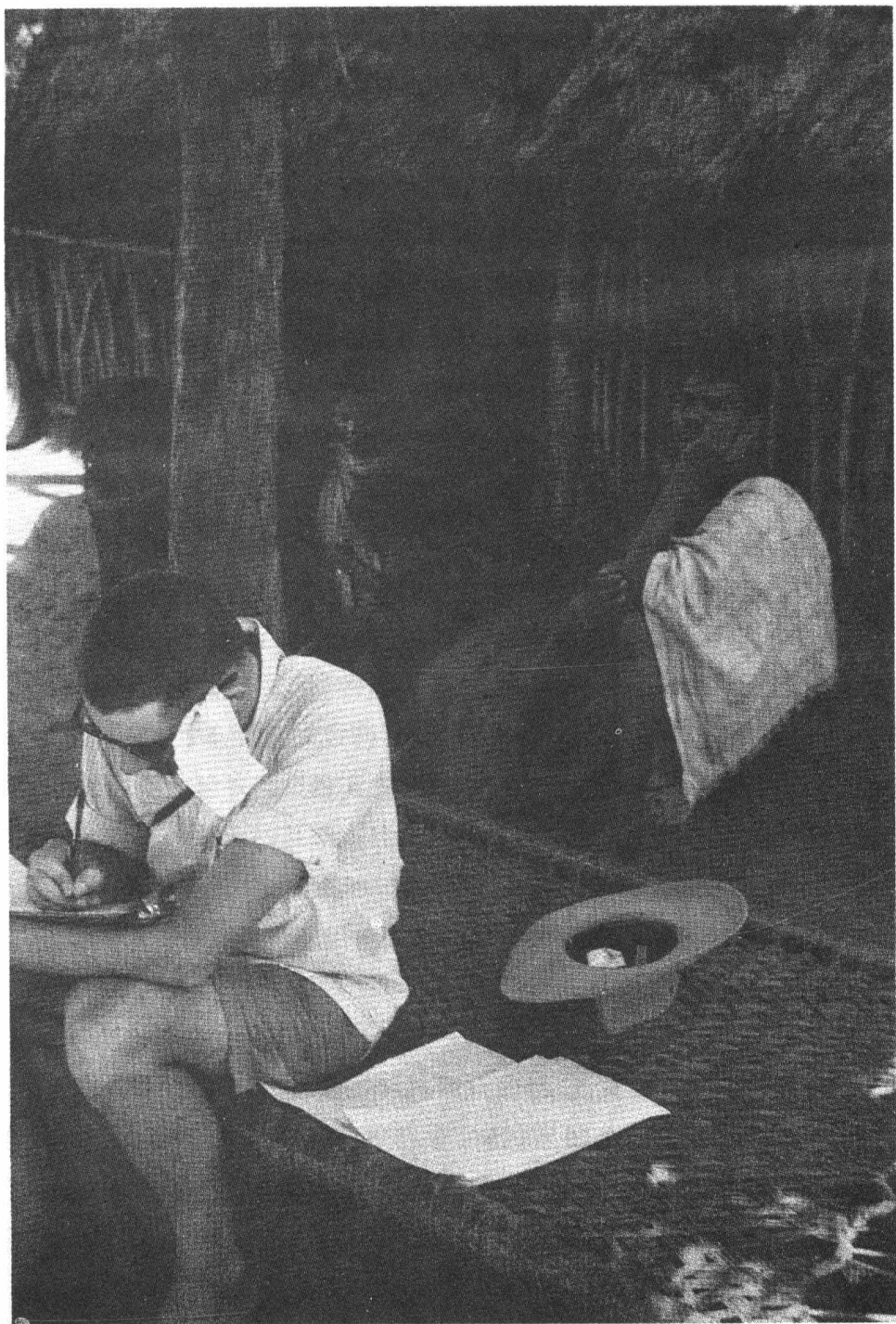
开本 787×960 1/16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5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34.00 元



斯蒂芬·泰勒在田野中,玛莎·G.泰勒摄。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总 序

学术并非都是绷着脸讲大道理,研究也不限于泡图书馆。有这样一种学术研究,研究者对一个地方、一群人感兴趣,怀着浪漫的想象跑到那里生活,在与人亲密接触的过程中获得他们生活的故事,最后又回到自己原先的日常生活,开始有条有理地叙述那里的所见所闻——很遗憾,人类学的这种研究路径在中国还是很冷清。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民族国家都要培育一个号称“社会科学”(广义的社会科学包括人文学科)的专业群体。这个群体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被期望扮演多少不同的角色,都有一个本分,就是把呈现“社会事实”作为职业的基础。社会科学的分工比较细密或者说比较发达的许多国家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发展出一种扎进社区里搜寻社会事实、然后用叙述体加以呈现的精致方法和文体,这就是“民族志”(ethnography)。

“民族志”的基本含义是指对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记述,希罗多德对埃及人家庭生活的描述,旅行者、探险家的游记,那些最早与“土著”打交道的商人和布道的传教士以及殖民时代“帝国官员”们关于土著人的报告,都被归入“民族志”这个广义的文体。这些大杂烩的内容可以被归入一个文体,主要基于两大因素:一是它们在风格上的异域情调(exotic)或新异感,二是它们表征着一个有着内在一致的精神(或民族精神)的群体(族群)。

具有专业素养的人类学家逐渐积累了记述异民族文化的技巧,把庞杂而散漫的民族志发展为以专门的方法论为依托的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这就是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科学的民族志”。人类学把民族志发展到“科学”的水平,把这种文体与经过人类学专门训练的学人所从事的规范的田野作业捆绑在一起,成为其知识论和可靠资料的基础,因为一切都基于“我”在现场目睹(I witness),“我”对事实的叙述都基于对社会或文化的整体考虑。

民族志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所磨砺出来的学术利器,后来也被民族学界、社会学界、民俗学界广泛采用,并且与从业规模比较大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结合,发展出宗教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教育人类学……

人类学的民族志及其所依托的田野作业作为一种组合成为学术规范,后来为多个学科所沿用,民族志既是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一种文体,也是一种方法,即一种所谓的定性研究或者“质的研究”。这些学科本来就擅长定性研究,它们引入民族志的定性研究,使它们能够以整体的(holistic)观念去看待对象,并把对象在经验材料的层次整体性地呈现在文章里。民族志是在人类学对于前工业社会(或曰非西方社会、原始社会、传统社会、简单社会)的调查研究中精致起来的,但是多学科的运用使民族志早就成为也能够有效地对西方社会、现代社会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文体。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的奠基人,涂尔干强调对社会事实的把握是学术的基础。社会科学的使命首先是呈现社会事实,然后以此为据建立理解社会的角度,建立进入“社会”范畴的思想方式,并在这个过程之中不断磨砺有效呈现社会事实并对其加以解释的方法。

民族志依据社会整体观所支持的知识论来观察并呈现社会事实,对整个社会科学、对现代国家和现代世界具有独特的知识贡献。中国古训所讲的“实事求是”通常是文人学士以个人经历叙事明理。“事”所从出的范围是很狭窄的。现代国家需要知道尽可能广泛的社会事实,并且是超越个人随意性的事实。民族志是顺应现代社会的这种知识需要而获得发展机会的。

通过专门训练的学者群体呈现社会各方的“事”，使之作为公共知识，作为公共舆论的根据，这为各种行动者提供了共同感知、共同想象的社会知识。现代社会的人际互动是在极大地超越个人直观经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展开的，由专业群体在深入调查后提供广泛的社会事实就成为现代社会良性化运作的一个条件。现代世界不可能都由民族志提供社会事实，但是民族志提供的“事”具有怎样的数量、质量和代表性，对于一个社会具有怎样的“实事求是”的能力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社会需要叙事，需要叙事建立起码的对社会事实的共识。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有事实就出议题，有议题就能够产生共同思想。看到思想的表达，才见到人之成为人；在共同思想中才见到社会。新闻在呈现事实，但是新闻事实在厚度和纵深上远远不够，现代世界还需要社会科学对事实的呈现，尤其是民族志以厚重的方式对事实的呈现，因为民族志擅长在事实里呈现并理解整个社会与文化。这是那些经济比较发达、公共事务管理比较高明的国家的社会科学界比较注重民族志知识生产的事实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中，民族志的缺失造成了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的许多缺陷。学术群体没有一个基本队伍担当起民族志事业，不能提供所关注的社会的基本事实，那么，在每个人脑子里的“社会事实”太不一样并且相互不可知、不可衔接的状态下，学术群体不易形成共同话题，不易形成相互关联而又保持差别和张力的观点，不易磨炼整体的思想智慧和分析技术。没有民族志，没有民族志的思想方法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扩散，关于社会的学术就难以“说事儿”，难以把“事儿”说得有意思，难以把琐碎的现象勾连起来成为社会图像，难以在社会过程中理解人与文化。

因为民族志不发达，中国的社会科学在总体上不擅长以参与观察为依据的叙事表述。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在运作中所需要的对事实的叙述是由文学和艺术及其混合体的广场文艺来代劳的。收租院的故事，《创业史》、《艳阳天》，诉苦会、批斗会，都是提供社会叙事的形式。在这些历史时期，如果知识界能够同时也提供社会科学的民族志叙事，中国社会对自己面临的问题的判断和选择会很不一样。专家作为第三方叙事对于作

为大共同体的现代国家在内部维持明智的交往行为是不可缺少的。

民族志在呈现社会事实之外,还是一种发现或建构民族文化的文体。民族志学者以长期生活在一个社区的方式开展调查研究,他在社会中、在现实中、在百姓中、在常人生活中观察文化如何被表现出来。他通过对社会的把握而呈现一种文化,或者说他借助对于一种文化的认识而呈现一个社会。如果民族志写作持续地进行,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文化上的丰富性就有较大的机会被呈现出来,一度被僵化、刻板化、污名化的文化就有较大的机会尽早获得准确、全面、公正的表述,生在其中的人民就有较大的机会由此发现自己的多样性,并容易使自己在生活中主动拥有较多的选择,从而使整个社会拥有各种更多的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界无法回避民族志发育不良的问题。在中国有现代学科之前,西方已经占了现代学术的先机。中国社会科学界不重视民族志,西洋和东洋的学术界却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民族志,描绘了他们眼中的中国社会的图像。这些图像是具有专业素养的学人所绘制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基于社会事实。然而,我们一方面难以认同它们是关于我们社会的完整图像,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生产出足够弥补或者替换它们的社会图像。要超越这个局面中我们杂糅着不服与无奈的心理,就必须发展起自己够水准的民族志,书写出自己所见证的社会图像供大家选择或偏爱、参考或参照。

这个译丛偏重选择作为人类学基石的经典民族志以及与民族志问题密切相联的一些人类学著作,是要以此为借鉴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推动民族志研究,尽快让我们拥有足够多在学术上够水准、在观念上能表达中国学者的见识和主张的民族志。

我们对原著的选择主要基于民族志著作在写法上的原创性和学科史上的代表性,再就是考虑民族志文本的精致程度。概括地说,这个“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的入选者或是民族志水准的标志性文本,或是反思民族志并促进民族志发展的人类学代表作。民族志最初的范本是由马林诺夫斯基、米德等人在实地调查大洋上的岛民之后创建的。我们选了米德的代表作。马

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最重要的开创之作,好在它已经有了中文本。

我们今天向中国社会科学界推荐的民族志,当然不限于大洋上的岛民,不限于非洲部落,也不应该限于人类学。我们纳入了社会学家写美国工厂的民族志。我们原来也列入了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描写英国工人家庭的孩子在中学毕业后成为工人之现象的民族志著作《学会劳动》,后来因为没有获得版权而留下遗憾。我们利用这个覆盖面要传达的是,中国科学学的实地调查研究要走向全球社会,既要进入调查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也要深入西洋东洋的主要发达国家,再高的成本,对于我们终究能够得到的收益来说都是值得的。

这个译丛着眼于选择有益于磨砺我们找“事”、说“事”的本事的大作,因为我们认为这种本事的不足是中国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软肋。关于民族志,关于人类学,可译可读的书很多;好在有很多中文出版社,好在同行中还有多位热心人。组织此类图书的翻译,既不是从我们开始,也不会止于我们的努力。大家互相拾遗补缺吧。

高 丙 中

2006年2月4日立春

《写文化》与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代译序)

高 丙 中

这里译介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是一次研讨会的论文集。1984年4月16—20日,十位中青年学者,其中八个是人类学家,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文艺学家,会聚在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菲(Santa Fe)的美洲研究院(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召开了一个题为“民族志文本的打造”(The Making of Ethnographic Texts)的研讨会。与会者当时都已经在民族志的文本分析和实践创新方面积累了独到的成绩,无疑是探讨民族志问题的一时之选。在一周的工作日里,每个与会者在预先已经认真研读过与会论文的基础上,专门承担一篇会议论文的审议和批评。这种小型专题研讨会是非常有成效的知识生产机制。充分准备,坦率批评,深入讨论,会后各人对论文认真修改,最后汇编成书,让学界在1986年见到了公开出版的《写文化》一书。

《写文化》问世后立即在人类学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反响,爆炸的余波也逐渐冲击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在过去20年里,它成为国际人类学界被引用得最多的一本书。一些资深人类学家因为认为它对以参与观察为途径的经验研究的反省破坏了科学民族志的学术基础,对它颇为不满(Marcus 1998:231—232)。但是这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即它在20年的时间里证明自己是民族志进入一个多元发展时代的主要推手。

把关于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在千百年的文献里,民族志的文章形式可谓千姿百态,民族志的文章内容可谓千奇百怪,很难进行分类。但是从作者的异地经历的参与深度和讲述心态来看,民族志的演进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的民族志是自发性的、随意性的和业余性的。有文字而又重文献的民族大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的民族志。中国史籍中的“蛮夷”传(偏重纪实的)、《山海经》中描写远方异族的文字(偏重想象的)可以归入此类。在西方追溯民族志的历史,希罗多德被推崇为最早的民族志作者。各个民族在文明的早期对异族的描述多有想象的内容,不仅是中国的《山海经》才写异形人,西方早期关于异族的记录也有这类想象,如对无鼻种族的描述、对嘴小到要用麦秆吸食的人种的描写(Oswalt 1972:14)。在中世纪,一些商人和朝觐者在东方旅行的见闻,如《马可·波罗行记》,是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民族志的代表。在西方的地理大发现之后,大量出现的民族志才主要以无文字的原始部落为对象。探险家因为主要以地理发现为目标,与土著只有短暂的遭遇,又不懂当地语言,所以对土著的描述都很浮浅。其中一些探险活动与土著的联系受到后世人类学家的关注,如库克(James Cook)船长在1768—1779年对太平洋岛屿的探险。其中一些著述被后来的民族志学者所重视,如赫恩(Samuel Hearne, 1745—1792)提供的关于加拿大西北部奇帕维安印第安人的知识成为关于这个部落的最早的民族志知识(Hearne 1795)。他描写了他们的季节性活动、超自然信仰体系、对爱斯基摩人的抢掠行动。它触及异族的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深度,算得上是此类民族志中的佼佼者了。这些都是利用路过异地异族的见闻撰写的民族志游记。再就是到土著地区居住的西方人所编写的民族志报告。一种情况是作为俘虏或者是作为意外后果而被迫在土著社会生活较长时间,后来侥幸跑回白人社会,把自己的经历和见闻讲出来,写成有较好的资料价值的民族志,它们关于异族生活的记录相当准确、具体而生动(Oswalt 1972:28—32)。一种更常见的情况是传教士以多年生活为基础所写的民族志。传教士长年累月与土著打交道,也逐渐学会了土著的语言,可以进行比较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但是他们的知识兴趣通常都很狭窄,他们的报告和记录主要围绕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方面,很少把笔触伸向当地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Oswalt 1972:41)。他们生活在当地,但是知识兴趣的褊狭使他们无意系统地表述当地社会生活。

在爱德华·泰勒撰写《原始文化》(1871年出版)需要征引信息质量高

的材料的时候,他应该是感到了已有的民族志记录的缺陷。所以他积极参与编撰《人类学笔记和问询》(*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1874年初版),主要为那些往来于英国殖民地的各种人士业余写作民族志报告提供调查和写作的大纲,以便新兴的人类学知识群体能够有信息更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可用(Stocking 1995:15)。这是人类学从业余时代走向专业化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业余的人类学主动指导业余的民族志,就开始了人类学把民族志建构为自己的方法的奠基工作。这个指导性的手册后来不断得以修改,对于提高民族志的信息质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人类学收编民族志、提升民族志,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还需要一个“文化英雄”。

先有民族志很久了才有人类学。但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来撰写民族志,民族志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通过学科规范支撑起“科学性”的时代。西方国家是从1840年前后一个一个开始成立民族学会、民俗学会、人类学会的。这些群体都需要来自实地的资料,有积极性介入被视为资料工作的民族志。人类学群体先是编撰调查手册(如英国的《人类学笔记和问询》)去影响他人调查并编写民族志的方式,后来就亲自披挂上阵。牛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厄里(Urry 1972)专门研究了英国人类学界指导实地调查的专用手册《人类学笔记和问询》从1874年到1912年期间四个版本的改进。第一版由泰勒等人执笔,其目的是指导旅行者对原始人进行准确的人类学观察,提供信息供英国国内的人类学者进行科学的人类学研究。第二版的民族志部分的引言是由大英博物馆民族志部的里德(Charles Hercules Read)撰写的,他在此提出了长期田野作业的命题:“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对构成本书的主体的询问题目哪怕是给出浮泛的答案,也有必要长期持续地居住在土著人之中”(引自Urry 1972:48)。在这个期间,支配英国人类学的泰勒这种人文学科背景的学者逐渐被自然科学训练出来的学者所取代,其代表人物是哈登(Alfred Haddon)、塞利格曼(Charles Seligman)、里弗斯(W. H. Rives)等人。在他们这些人负责的第四版的相关章节已经对田野作业的语言要求和一年周期的时间要求给出了明确的说法。

1912年的第四版与以前不同的是,它更像是主要为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的观察者而非旅行者准备的。马林诺夫斯基是带着这个手册去他的田野的。虽然他后来曾经把这个手册视为他的科学方法的反面教材(Malinowski 1944:27),但是他身后被公开的日记证明他是一边做田野一边参考该手册的,他甚至在一个段落里两次提到翻看该手册:

我写日记,一边看《人类学笔记和问询》,一边试着综合我得到的资料。准备出门。晚餐。在这期间试着把谈话引到民族学主题上。晚餐后与韦拉卫简单地谈话。又读了几页《人类学笔记和问询》,装好照相机。然后我到村子里去;月夜皎洁。(Malinowski 1967:30)

这个手册的新版本的系统指导以及马林诺夫斯基的个人际遇使《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成为民族志的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马林诺夫斯基于1884年4月7日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兰的克拉科夫,1902年进入大学读物理学和数学,并对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从基本的学科底子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受到现代科学专业训练的学子。1908年,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其具体的专业领域是物理学和数学。他在1910年进入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作为一名研究生加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行列。此时的英国学术界大兴实地调查之风,其调查模式不外是在短时间里(几天和几周)借助翻译询问土著中的知情人。1914年,塞利格曼教授帮他弄到了一点资助,马雷特教授(R. R. Marett, 1866—1945)等人正好要到澳大利亚开会,安排他做会议秘书,他的旅费由澳大利亚政府掏。他们在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7月28日—1918年11月11日)爆发之前启航。学术会议结束后,他开始去作实地调查,这时是1914年9月12日。由于世界大战的形势,他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一直待到1920年。他在当地属于敌国公民,所幸他的一位老师哈登把他推荐给了他的私人朋友汉特(Atlee Hunt)这位澳大利亚政府的高级官员。他写了许多封信给有关人士为马林诺夫斯基要经费、要通行证,在不利于马林诺夫斯基的谣言兴起时(如说他同情德国、不值得信赖等)为他说话(Young 1988:5)。

他在1914至1918年之间以澳大利亚为根据地,先后三次到新几内亚进行调查,三次调查花去了他两年半的时间。他第一次的调查依靠翻译,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调查都是直接使用当地土著的语言。这段经历及所获资料构成他一系列著作^①的基础以及他1920—1938年在伦敦讲学的核心。他的这些著述和教学活动作为榜样被后学所追慕,成为现代人类学的学术规范的核心内容。

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导论”中总结自己的田野调查经验,确立了“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的准则。科学的民族志必须做到搜集资料的主体与理论研究的主体的合一。这二者在发生学上的分离或者分工,经过许多人多年的努力,终于由马林诺夫斯基在自己身上首次完美地达到合一。在此前的努力过程中,两个研究项目值得特别一提。在1898年,哈登率里弗斯、塞利格曼等人在托雷斯海峡周围对土著进行实地考察,其调查方式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通过翻译询问土著中的知情者有关的问题,记录下答案作为研究资料。这种资料对于描述社会行动和复杂的情景来说,往往是过于简略了。这是人类学家主动去现场获得资料的开始,是人类学界把资料员和研究者的身份合一的努力的开始。随后,里弗斯在1906年出版《托达人》(Rivers 1906)。这是他在印度的一个部落进行约半年的实地调查之后完成的。他在方法上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但是在时间上没有达到一年的周期,他也未能生活在土著人之中,搜集资料也依靠的是翻译。马氏检讨了这种调查工作的局限,指明了克服其局限的必由之路:人类学家去土著村落里生活,用一套有效的科学规则把资料员和研究者的身份完美地合而为一(马凌诺斯基 2002[1922]:6—7)。成功地达到这个目标的首要原则是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而无需其他白人的介入。他自己当时的做法是把帐篷搭建在土著的村落之中,与土著保持“亲密接触”。真正生活在土著之中与偶尔钻进土著人群询问若干问题在效果上是全然不同的。与询问相比,“参与其生活进行观察”在获得信息的深度和广度上是非常不同的。

^① 如《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1927)、《原始社会的性与压抑》(1927)、《野蛮人的性生活》(1929),以及《珊瑚园艺及其巫术》(1935)。

一些现象靠询问是根本无望获得的,只能在完全具体的现实状态中被观察。

“科学民族志”保证田野工作质量的其他条件是较长时间的实地生活经历以及对土著语言的掌握和熟练使用。据马林诺斯基自己回忆,他起初进入村子,只能用洋泾浜英语寒暄,自己很难与土著进行细致而明了的对话。他逐步试着采用土著人(Kiriwinian)的语言工作,开始在做记录时直接以转译法将土著的陈述要点转译为自己的语言写下来,可是转译常常将语境自身所有的重要特征消磨殆尽。他慢慢地不得不以土著语言把重要的短语按其被说出时的情形记录下来。他说,随着我的语言知识的进步,我记下了越来越多的土著语言的句子,直到最后,我发现自己完全以那种语言书写,对每一陈述都能逐字逐句飞快地笔录下来。用土著语言作为实地调查的工作语言,这是博阿斯、哈登、塞利格曼、里弗斯没有做到的,也是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做安达曼人的调查的时候所做不到的(Stocking 1995:307)。马林诺夫斯基在连续时间的长度和语言的熟练程度上都是划时代的。居住一年左右、使用调查点当地的语言,后来成为人类学博士培养计划的要件。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文本和马林诺夫斯基对民族志和田野作业的科学规则的陈述对于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被世人所接受发挥了关键的作用。1920年代以后的人类学学业的主流是由马林诺夫斯基奠定的范例和规则所构成的。

民族志发展的第三个时代是从反思以“科学”自我期许的人类学家的知识生产过程开始萌发的。知识创新的批判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渗入实地调查的经验研究方法之后,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催生了人类学的反思意识(Scholte 1969)。人类学家对于自己的学术活动作为一种具有政治经济的动因和后果的社会实践的反思和批判是从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密切却被忽视的联系开始的(Gough 1968; Asad 1973)。民族志研究被置于反思性的审视维度之中,在1977年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民族志此前一直是通过田野作业单方面地记叙作为研究对象的群体的故事,拉比诺(Paul Rabinow)的这本薄薄的大作以十足的创意把田野作业过程本身作为记叙的对

象。民族志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记叙异民族的奇特或神秘的现象的,同时,作为保证民族志的科学性的田野作业的过程对于圈外人来说也是秘而不宣的。拉比诺用民族志把这个秘制科学性的神秘过程展现出来,让读者看到,他在调查中并非客观的观察者,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行动,甚至像当地的混混儿一样接受性招待;而那些被研究的人也是复杂的人,并非只是被观察者,他们也在主动利用他。

布迪厄在跋中直接把拉比诺的创意概括为“把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他说,拉比诺把解释者的使命转变为针对他自己、针对他的解释。他以一组“决裂”来提升拉比诺的著作对于人类学的划时代意义:“这种以一种明显的自恋面向自我的转折,本身是一种与文学灵感迸发的那种自我满足的决裂,不仅如此,这远不是导致什么私下的坦白,代之的是对求知主体的一种客观化。但是,它标志着另一种更具有决定性的决裂,即与实证主义对科学工作的观念决裂,与对‘天真的’观察的自满态度决裂,与对尼采所谓的‘纯洁受孕的教条’的毫无杂念的自信决裂,与不考虑科学家、而把求知主体降低到登记工具的科学所依赖的奠基思想决裂……”(Rabinow 1977: 163)。拉比诺把求知主体作为对象,承认知识是涉及主体的一种建构,凝视(gaze)、观察(observation)等看的方式不是天真纯洁的,结论的得出是复杂的人为产物,并不是像圣母玛利亚童贞受孕那样的无中生有。

通过民族志方法以反思人类学学术活动的主体(自我)及其背后所依赖的价值、假设,在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之后蔚为风气,相继出版的杜蒙的《头人与我》(Dumont 1978)、克拉潘扎诺的《图哈密》(Crapanzano 1980)、德怀尔的《摩洛哥对话》(Dwyer 1982)都在尝试怎样在民族志中把调查对象写成主体、行动者。这些呼应渐成声势,后来他们在1984年采取集体行动聚会研讨,把目标定为:勾勒、彰显、辨析此前一个世纪产出民族志文本的实践,并检讨近期民族志撰写的各种创新。

1984年的研讨会文章和会上的讨论主要聚焦于跨文化描述的特殊修辞,作者权威与叙述形式的结合方式,口头话语(包括田野作业的话语)被记录成为代表性的叙述的方式,所描述的对象被分类与组合的方式,权力与知识所处的变化中的历史语境,学科的制约条件,民族志与相互牵涉的一些文

体(诸如旅游读物、小说、历史记叙)的边界的变动,以及社会科学、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风格(Marcus and Clifford 1985:267)。他们尝试去做的,既是对文化人类学的过去进行再解释,也要开启未来的可能性。原来,民族志通常是被看做很单纯(纯科学、客观)的,他们对一些代表作的复杂内容和方法的解析曾经一度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定了民族志,但是,后来的发展却显示,他们的努力让后来的学者进行新的探索具有了自觉性和正当性。

这次研讨会也留下了一些缺陷和遗憾。正如会议的组织者自我检讨时所说的,此次研讨会上没有一篇是从女性主义立场写作的,也没有一篇是从非欧洲的视角看问题的(Marcus and Clifford 1985:268)。这两个话题后来都是人类学的热点问题,女性主义和非欧洲白人男子中心的民族志给更多的人在世界学术界提供了进入并立足的机会。

同仁研讨会是磨炼思想的熔炉,参会的一些文章经过了较大的改进,如拉比诺的会议论文是“强而有力的作者:图书馆的幻象”,收入《写文化》时就修改得更精致了。但是,后来的文集也有一个美中不足。参会的十个人都提供了文章,但是文集只收录了其中九个人的会议论文的修改本。

文集中缺漏的是南非开普敦大学人类学系的桑顿(Robert J. Thornton)的文章,它在拖延了很久之后以“民族志整体观的修辞法”(Thornton 1988)为题发表在《文化人类学》杂志上。他原先提交给会议的论文题目是“章与句:民族志写作中作为修辞手法的分类”。他抓住了民族志的一个核心环节。通常认为,民族志研究者以整体观(holism)看待自己的对象,或者说,民族志的使命是以整体的方式写出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不管怎么说,这种效果都要通过文本来达到。可是,分析起来,民族志的文本是由章句构成的,章句所写的只能是片段。从片段到整体或者整体性的效果,民族志肯定有特殊的招数。

桑顿认为,民族志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运用“撰写”让“日常”与“历史”和“环境”发生关系。既然撰写是想象的一种产物,那么正是在想象中,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的合成才得以发生。不像只是描绘眼前的软体动物的动物学,民族志学者必须把社会想象为一个“整体”(whole),并且通过对眼见的